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

西域史地探微

郭平梁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

西域史地探微

郭平梁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域史地探微 / 郭平梁著.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1.7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

ISBN 978-7-228-14363-4

I. ①西… II. ①郭… III. ①西域 - 历史地理 - 文集 IV. ①K928.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2488 号

责任编辑 贺 灵

整体设计 王 洋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991)3652361
印 刷	新疆八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460 千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定 价 46.00 元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编委会

一、编辑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主任委员：吴福环

副主任委员：阿不都热扎克·铁木尔

委员：苗普生 张运德 阿布都热扎克·沙依木 库兰·尼合买提
刘仲康 潘志平 董兆武 田卫疆 齐清顺 王 宁 马品彦
郭泰山 刘国防 阿不都热依木·哈力克 阿班·毛力提汗
米娜娃·阿不都热依木 白 莉 艾比布拉·阿不都沙拉木
李晓霞 木拉提·黑那亚提 李树辉 宋建华 柴 林

主 编：吴福环

二、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

主 任：李行力

成 员：王 磊 古丽巴哈尔

序

哲学社会科学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职责。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是人类文明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发展前景美好。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快速变迁的今天,新疆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新疆社会科学院正式挂牌成立于1981年,30年来,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新疆改革开放及社会稳定大局,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社会田野调查和系统精专的学术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新疆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开始进行农牧区调查和有关新疆历史问题、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足迹踏遍天山南北、绿洲草原,身影留在农家小院、牧民毡房、工厂车间、学校课堂、兵团连队、军营哨所,查阅和整理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图书档案,撰写调研报告,发表学术论著,领域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新疆历史、社会、政治、法律、经济、民生、民族、宗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文化以及新疆周邻的中亚等国际问题。几十年来,这些研究成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劳动,几十年“冷板凳”,几十年“爬格子”;身居陋室,

心怀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春蚕吐丝,似蜡烛燃烧。这些正是中国千千万万爱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几十年来,新疆社会科学院几代专家学者出版了数百上千部著作、数万篇论文和研究报告,其中蕴含着他们的心血和赤诚。他们是新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见证人。2008年,新疆社会科学院决定支持和资助院里具有正高职称(研究员、教授)的专家学者每人出版一部文集,先从离退休专家学者做起,逐步扩展至在职者,每人从自己毕生发表的大量论文中精选数十篇代表作,结集成书,经新疆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审核通过后付梓出版。每一部文集都是作者辛勤耕耘的结晶和智慧的阐发。阅读这一部部文集,我们可以看到每位作者的学术历程和进步,也可以从中看到新疆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这套文库的出版,是多年来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科研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现,是奉献给社会的一批精神财富。同时,这些成果对于年轻研究人员来说,也是一套极有价值的学习资料。

我衷心祝贺这套文库的顺利出版,并祝愿新疆社会科学院不断推出更多更新更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从而为推进新疆的跨越式发展、社会长治久安以及各民族文化和谐作出应有的贡献。

吴福环(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2010年10月10日

自序

1958年8月下旬的某一天,我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这就是我在新疆学习、工作、生活的开始。

我是作为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以下简称新疆调查组或调查组)的一员而来到新疆的。据介绍,新疆调查组成立于1956年,至1958年人员扩大,增加的主要为北大历史系和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高年级学生。我那时是北大历史系五年级学生。全国其他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也都有这样的调查组,也都有这两个学校的高年级学生参加。

这次调查组的具体任务是编写五套丛书,其中最主要的是各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我在乌孜别克族组的工作开始于查阅资料。当时调查组的要求是边调查、边编写。本组的编写任务落在我的身上,我就在招待所里边整理调查资料,边考虑史志的框架,有的就顺手写成文字,所以离开调查地伊宁时(十二月底或稍晚)就已经有了一份很粗糙的稿子。乌孜别克族史志草稿很快出手。我国的塔塔尔族状况与乌孜别克族颇相似,如人口数及其分布,职业,来源(大都来自俄国塔塔尔斯坦的商人及其后裔)等,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其史志的编写任务也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我完成这项任务后我们一行数人就返校完成毕业事项。

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但工作仍借调在新疆调查组。从这时开始我就参加到柯尔克孜族组。柯尔克孜族历史在我国少数民族历史中占有相当突出的位置。在时间上可以向上追溯到秦汉,而且在时间的延续上也基本上可以衔接起来;在有的朝代他们的活动非常引人注目,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明显,留传下来的资料很丰富。

调查组将“史志”、“概况”诸路大军调集起来,主要是为了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对各种书稿彼此提出意见,偶尔也调动一些执笔人相互临时支援。到了60年代前期,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将所有史志稿子,铅印成册,作为资料保存,有的也散发出来了,做得很正确。

1962年5月,我们离开新疆调查组,到新疆科学分院民研所上班。这一年9月间,自治区实行三科(科委、科学院、科协)合署办公,科学分院从南梁搬到新市区的住地。

1963年10月,三科机关党组副书记哈林到民研所召开会议,传达自治区党委的意见,要求民研所编写一本《新疆简史》。为时不久,就拿出了一份油印稿。1965年6月,在昆仑宾馆召开简史讨论会,区党委很重视。会开了近一个月,每天出“简报”,晚上编,我是编者之一。会后,根据会上提的意见和林勃民讲话精神,对书稿又进行了一次修改。不久,古代部分完稿时分为6章,第五章将宋辽金与元合并,共约十万余字,作为上册先出,印了五千多册,内部发行。还未来得及在书店面市,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开始,只能作罢。

文革期间,民研所的科研工作基本停顿,但在“闹革命”之余,人们也并非都在闲着。以前新疆可以直接从苏联进书,新出的《巴托尔德文集》就是这样进来的,所资料室进了几本,我也买了几本,可惜没有买全。我着手翻译他的代表作《蒙古侵略时期的土耳其斯坦》,很吃力,但还是一口一口地往前啃。我的部分译文后来分别发表在《新疆文物》、《中亚研究》上。约在70年代初,当时的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在中国西北部边界问题上大做反面文章。中国政府立即发布文件,进行反驳。大约就在此时或稍后,国务院下发指示,要求对苏联政府的反华言论进行反驳,所列项目有新疆历史、新疆历史资料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民研所一部分人被派到北京故宫档案馆摘抄新疆资料,一部分人被派到西安西北大学摘抄《清实录》中的新疆资料。

1975年夏,《新疆简史》上册已经出版,要改写,主要是增加资料。《新疆简史》第一册、第二册于1980年8月同时出版。《新疆简史》第一册、第二册出版后在新疆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也进入到内地的一些地方、单位和个人手中,在新疆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会上没有异议地被评为特等奖。在新疆民研所,除了搞《新疆简史》而外,也做了一些其他工作。《柯尔克孜族简史》是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之一种于1985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书约15万字。历史部分主要是我补充、改写的。《回鹘史指南》是作为孟凡人、黄振华主编的《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指南丛书》之一种由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的,是我与刘戈合作完成的。《中国历史大词典·民族史卷》我被列为编委名单,是新疆分编委副主委,

编委主委是谷苞,副主委还有玉素甫·艾则孜,工作主要是我做的。在此同时,《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也逐步展开,我也应约为之撰写了有关新疆历史的词条释文若干条。我在报章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2003年,我国公布《新疆的历史与发展》一文,简称“白皮书”,对美国公布的什么“新疆工程”进行反驳。我表示拥护,并以书面形式向国务院新闻办等单位对“白皮书”提了一些意见。我参加了新疆和全国的好几个学会,并被选为理事什么的。改革开放以来,到自治区访问的外宾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有好多次我被邀请参与了接待,任务是对外宾介绍新疆的历史。从1983年开始,新疆开展民族团结月活动,时间是每年5月份。第一个民族团结月开始时,新疆青联、学联到新疆社科院请人做报告,院领导指派我去。我的报告主要讲新疆和内地历史上那些坚持民族团结、坚持祖国统一的生动事例和人物。

改革开放初期,新疆民研所出现一些新现象,即好几位经过平反的重新启用的老一辈业务人员被安排进来了,他们是:穆提依、尼华德、乌提库尔。还可以加上何锐,他是汉族,但维哈语的听、说、译水平与维、哈族没有什么差距,他在“文革”前夕就进所了。通过这些人在社会上招揽和组织有专长的人,我们共同酝酿翻译世界名著《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自治区拨专款支持了这一项目。两本书的维文译本、汉文译本都已分别出版发行。差不多与此同时,中亚所亦将佚名著作《世界境域志》由英译本译成汉文。前苏联学者谢吉列夫名著《南西伯利亚史》已由中科院考古所莫润先等人译成汉文,我到北京经黄振华介绍,将译稿引进民研所,并铅印使用。中科院历史所耿升由法文译成汉文的《丝绸之路》译稿亦通过我引进我所,也内部印行。

我主张研究历史要多下去做些实地考察。改革开放初期,上级给我们所配备两辆车,一辆北京吉普,一辆中型卡车。时我任副所长,我们古代史室数人乘中型卡车到准噶尔盆地东南沿边走了一趟,从昌吉到奇台,向北到了沙漠边缘。我们到了吉木萨尔,往北到了破城子,那就是唐北庭都护府的遗址。某年,自治区文史馆与参事室组团下去考查,我是文史馆馆员自然可以参加。先到塔城,然后到博尔塔拉,然后到伊犁。我们到了阿拉山口,那时新疆到哈萨克斯坦的铁路已经通车,车站及附近建筑物还在继续施工,人不多,风很大,我们停留的时间不长。我们也到过霍尔果斯,通向哈萨克斯坦的汽车通过那里,人烟的密度和繁忙的程度都要超过阿拉山口火车站。

在霍尔果斯,我们参观了秃黑鲁·帖木耳汗的陵墓。此次考查虽然为时不长,但收获很大,充实了我在新疆的生活。

我在新疆,却与远在数千里外并隔有大海的台湾挂上了钩。第一件事是台湾的一个代表团到新疆访问,约十来个人,我参与了与他们的座谈会。第二件事是国民党中常委胡秋源到新疆访问,我们三四个人同他座谈,我们发言讲新疆历史,他也侃侃而谈。第三件事是与台湾中央大学民族研究所几个同行进行了学术交流,他们是林恩显、刘义棠、阿布都拉等。刘义棠先生懂古突厥语,后来刘戈著作《回鹘文买卖契约译注》在台湾出版,他是审稿人,提供了许多中肯而有益的意见,并作修改。

目 录

序	(1)
自序	(1)
“大宛汗血天马”揭秘	(1)
武威雷台墓墓主、铜奔马命名释义及墓葬断代	(13)
汉代民族“和亲”并非民族间的政治联姻吗?	(26)
匈奴西迁及一些有关问题	(43)
西汉以来新疆就是中国的领土	(57)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	(62)
匈奴等北方民族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	(67)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有哪些民族?	(75)
魏晋南北朝时期车师、高昌地区的民族及其相互关系	(88)
鸠摩罗什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	(106)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地区	(120)
骆宾王西域之行与阿斯塔那 64 TAM 35:19(a)号文书	(122)
《虞弘墓志》新考	(136)
唐朝王奉仙被提案文书考释	(148)
突骑施苏禄传补阙	(161)
阿史那忠在西域	(178)
汉唐时期新疆社会经济文化概述	(186)
回鹘西迁考	(213)
纥·霍尔(Hor)·回纥	(233)
“海客谈瀛洲”及其他	(242)
高昌回鹘社会经济管窥	(255)

从坚昆都督府到黠戛斯汗国	(274)
十至十八世纪初的乞儿吉思	(290)
谈谈唐朝在西域的几项军政建置	(308)
唐朝少数民族大将契苾何力	(323)
阿史那社尔在新疆的活动及其为人	(326)
“汉日天种”与“姑娘城”的传说	(331)
为什么要曲解“桃花石”？	(333)
丘处机笔下的阿尔泰山和天山	(338)
读史札记	(342)
清初阿克敦新疆纪行诗考释	(346)
西域研究应向纵深发展	(350)
任重而道远	(352)
中亚研究刍议	(357)
《中亚民族历史译丛》前言	(363)
《刘戈〈回鹘文买卖契约译注〉》序	(367)
潘志平《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序	(376)
墙里墙外,花开花落	(379)
关于清史体例的意见	(385)
试论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387)
也谈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与特殊性	(397)
隋文帝统一天下的主要助手高颀	(410)
唐代“救时宰相”姚崇	(419)
北方、西北方民族史的几个片段	(429)
少数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应该加强	(438)
研究成果目录	(440)
后记	(444)

“大宛汗血天马”揭秘

——兼说中国家畜家禽阉割传统

汉太初四年(前101),李广利自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地区)班师回朝,取大宛“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而归。^①令人惊诧的是:这数十匹善马竟然既不见牡的,也不见牝的。这可能吗?天机就隐伏在其中,也是从其中泄露出来。一群马既不见牡的,也不见牝的,那就意味着它们是不能生育的,是不能繁衍后代的。那不可思议的问题又来了,不能生育的马其自身又来自何处呢?张骞的报告说: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②对于这种说法,后人又作了更具体的解释,说:“大宛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交,生驹汗血,因号曰天马子”。^③“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时大致分布于今伊犁河流域)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④下一实例说明,天马之说在其本土不仅也有流传,而且还被制作成艺术形象,供人礼敬。“铜马,俱德建国(今中亚库巴的安)乌浒河(阿姆河)中,滩派中有火袄祠。相传袄神本自波斯国乘神通来此,常见灵异,因立袄祠。内无像,于大屋下置大小炉,舍簷向西,人向东礼。有一铜马,大如次马,国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中对神立,后脚入土。自古数有穿视者,深数十丈,竟不及其蹄。西域以五月为岁,每岁日,乌浒河中有马出,其色金,与此铜马嘶相应,俄复入水。近有大食(阿拉伯)王不信,入袄祠,将坏之,忽有火烧其兵,遂不敢毁”。^⑤此段记载虽晚在张骞之后好几百年,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将铜马神性与袄祠联系在一起,而且明示

① 《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7页。

② 《史记·大宛列传》,第3160页。

③ 《史记·大宛列传》,注引《汉书音义》,第3160页。

④ 《史记·大宛列传》,第3170页。

⑤ 《酉阳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8—99页。

此祠建于阿拉伯统治中亚之前,这就使得这一记载内涵的时代可以大大提前。

(一)

对于上述有关“天马”的说法,中国人似乎一开始就是将信将疑。信,是说将之记载下来,并传播开去;疑,是说对于一些与之相反的事例也很留意。元狩三年(前120)“夏,马生余吾水中”,《汉书》注引应劭曰:余吾水“在朔方北也”。^①这里虽然是在附会天马来源之神奇,而实则此马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元鼎四年(前113)“秋,马生渥洼水中”,^②这也是在神化此马之出生,虽然司马迁在记载此事时在“马”字前加了个“神”字,但《史记》注又引李斐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燠煌界。人数以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旁。利长先为土人持勒鞮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鞮,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③这也是对天马说的一种直接否定。

完全相信也好,将信将疑也好,总之,那个“马”字前头的“天”字或“神”字,都是罩在那种马的真实情况之上的一团雾。这种被神话、传说、迷信、偏见等包裹着的事物与人物在历史上是俯拾皆是、屡见不鲜的。其中有的经过科学研究已经恢复了本来面目;有的则需要继续进行研究,加以澄清,这也是今天和以后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这里所说的在“天”字覆盖之下的马实际上是一种什么马呢?一群数十匹比原来来自乌孙的天马更强壮的马竟然完全失去生育能力,是完全违反自然规律的,这种马只有经过人工处理之后才有可能产生,也就是经过人工阉割才能够造成。这并非出于主观臆测,而是客观逻辑的必然结论。法籍伊朗裔学者阿里·玛扎海里在自己的著作《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里说:“据某些人认为,波斯商人为了不使他们那有利可图的贸易源泉枯竭,唯有向中国出口驢

① 《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6页。

② 《汉书·武帝纪》,第184页。

③ 《史记·乐书》,第1178页。

马。”^①作者虽然以非常不确定的语言提出这一论点,并且随着说了许多疑虑,这是由于他尚未注意到一些具体情况和细节的缘故。李广利所立的大宛新王昧蔡在汉军撤离后一年多时间内被杀,前王毋寡的弟弟蝉封被立为王。蝉封对汉朝仍持友好态度,并“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②这不能不又一次令我们为之惊诧。一年二匹,从使用的角度看,多么微不足道啊!但汉朝竟然未与争辩地就接受了这一事实,这与他们原来追求这种马的态度简直有着天渊之别,其中必有重要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汉朝在获得所谓天马之后也就得知这种马的秘密,而中国早就具有对家畜进行阉割的知识,从而对这种马的热情也就大大降低。类似大宛这样为了保持自己对某种产品的垄断地位而阻止外流的做法,汉朝政府当时也曾干过。吕后当政时,汉朝与南粤王赵佗关系紧张,为了压制赵佗,吕后下令禁止几种产品入南粤等地:“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③

能够直接说明天马奥秘的,也就是这种马是经过阉割的,还有汉朝人对它的另一通称善马及由之而产生的驪马这一名称。张骞第一次通西域给汉武帝的报告称,大宛“多善马”。后来的使者又向汉武帝报告说:大“宛有善马在贰师城”。汉武帝旋又“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汉武帝派李广利“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云。李广利至大宛因损失惨重而擅自返回敦煌,汉武帝大怒,以为若不胜大宛,后果之一是,“而宛善马绝不来”。李广利在敦煌增兵后复西进,并“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善马云”。汉军兵临城下,宛贵人相与谋曰:“汉所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马而杀汉使。今杀王毋寡而出善马,汉兵宜解”。他们又对汉军曰:“汉毋攻我。我尽出善马,恣所取”,“即不听,我尽杀善马”。汉军许宛之约,“宛乃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而罢兵”。^④可见,在西汉时,人们对于天马的另一通称是善马,其含意与良马、宝马、千里马等是一致的。“善”是普通形容词,加在“马”字的前面,意思就是好马,另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含意。在得知这种马乃是经过阉割的马以后,乃继续称之为善马,于是渐渐地善马就成了经过阉割的马的另一专用名称。

① [法]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年,“导论”第18页。

② 《汉书·西域传》,第3895页。

③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3851页。

④ 《史记·大宛列传》,第3160—3177页。

后来,一些善于推敲汉字的文人,大概觉得以“善”字形容马,不十分贴切,于是创造一个“驪”字以代替,驪、善同音,完全保持了流传已久的习惯,新意指称的是一种马,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东西。“驪”字未见于许慎《说文解字》,很可能东汉以后才出现。葛洪《抱朴子·地真卷》录有崔文子《肘后经》,其中列有“驪马”名目,^①可见晋或晋以前就有了“驪马”一词。后来又有扇马一词,音义完全仍旧,只是将偏旁“马”字简化掉了。由善马而演变成驪马或扇马还有一条很有力的佐证,上引《肘后经》所列阉割家畜中有善狗,所指也就是驪狗。《旧五代史·郭崇韬传》崇韬尝从容白继岌曰:“神器在手,宜尽去宦官,优礼士族,不唯疏斥阉寺,驪马不可复乘”。^②“驪马”《新五代史·郭崇韬传》作“扇马”。^③

罩在大宛马上的云雾除“天”字而外,还有个“汗血”,这也应该解释清楚。汗血之说是怎么来的呢?不是“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交,生驹汗血”吗?这不就是暗示“生驹汗血”是渊源于“五色母马”吗?由此得知,流经赤色马毛上的汗,一眼看去,像是汗血,再加上渲染夸张,汗血马之名不就出来了吗?当然,关于马汗血的说法,并未到此为止。东汉应劭注“汗血马”曰:“大宛旧有天马种,蹋石汗血。汗从前肩膊出,如血。”颜师古进一步注曰:“蹋石而有迹,言其蹶坚利。”^④《说文解字》:膊“肩甲也”。^⑤十一世纪喀什噶尔人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说:“ulux,马肩隆。这个词在谚语中是这样用的:马鞍疮会留给儿子。这是说,由于肩隆部多骨节和肌腱,一旦磨伤,不易痊愈”。^⑥为什么“汗从前肩膊出,如血”?因为前肩膊贴近马鞍,容易磨伤,一旦用力过猛,马鞍疮就要流血,而这种马鞍疮是不易痊愈的,故常流血,汗、血并流,不就是汗血?!《东观汉记》曰:“闻武帝歌天马霑赤汗,今亲见其然,血从前膊上小孔中出。”^⑦这种描述,与上述材料所示,如出一辙。再往后,渐渐地马汗血这一奇迹,在文人的笔下,就只是词藻的玩弄,而与事实远离了。如梁简文帝萧纲(550—551年在位)《紫骝

① 《康熙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亥集上,马部,第11页。

② 《旧五代史·郭崇韬》,北京,中华书局,1967年,第772页。

③ 《新五代史·郭崇韬》,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0页。

④ 《汉书·武帝纪》,第202页。

⑤ 《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86页。

⑥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北京,民族出版社,第一卷,第73页。

⑦ 《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卷93,第1616页。

马诗》曰：“青丝悬玉蹬，朱汗染香衣”。又《繫马诗》曰：“青骊沉赭汗，绿池悬花蹄”。又梁元帝萧绎（552—555年在位）《赋登山马》诗曰：“汗赭疑霏勒，衣香不逐风”。^① 诸如此类，已与汗血马的实际情状风马牛不相及了。

“大宛汗血天马”这是古代中国对那种马的通称。关于“汗血”、“天马”的真正内涵已如上述，这里要解释的是“大宛”一词。“大宛”是中亚古国名，中国人所知的汗血天马出自此地是没有问题的，但作为一种良种马其祖籍何在呢？这就需要对其作更深一层的探究。司马迁称大宛千里马为蒲梢马，《史记索隐》云：“梢音史交反。又本作‘骚’，亦同音”。^②《汉书·西域传》有“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之说。^③《晋书·食货志》有“葱右蒲骚之骏”。^④蒲梢或蒲骚就是波斯一名当时的汉译。就是说，汉唐人都知道大宛马就是波斯马。关于这一问题在《武威雷台墓墓主、铜奔马命名释义及墓葬断代》一文中有较详的论述，兹从略。上引法籍伊朗人阿里·马扎海里在自己的著作《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也毫不含糊地认为在历史上十分出名的汗血天马就是波斯良种马。

（二）

据专家研究，中国早在传说时代就已有了对家畜进行阉割的技术，不过早期可能用于汰劣留优，以达到选种的目的。^⑤波斯良种善（驎）马在“大宛汗血天马”的名义下在中国可以说是声名显赫，影响深远，但所起的实际作用则很少，这首先是因为这种马进入中国的为数简直是微乎其微，而且又深藏于宫廷，不能繁衍后代。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已有自己的驎马，只不过名称有异而已，从而并不十分倚重进口的波斯良种驎马。

敦煌悬泉汉简：^⑥

二二，建昭元年（前38）八月丙寅朔戊辰，县（悬）泉廐……传马一匹，驎

① 《艺文类聚》，卷93，第1620页。

② 《史记·乐书》，第1178—1179页。

③ 《汉书·西域传》，第3928页，据《史记》，蒲梢即大宛汗血马，不是两种马。

④ 《晋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80页。

⑤ 谢成侠：《中国养马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37—38页。

⑥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81、82、84、85、112、116、131页。